

# 石鼓山商周墓地 M4 再识

丁 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副研究员)  
王占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16.01.003

鉴于宝鸡石鼓山 M4<sup>[1]</sup>的重要性,笔者拟在《石鼓山商周墓地 4 号墓初识》<sup>[2]</sup>的基础上,从墓葬级别、随葬青铜礼器的属性及组合等方面再次对其进行探讨,以揭示此次发现的内涵和重要意义。

## 一 墓葬级别

本文从石鼓山 M4 的墓室规模、壁龛数量、随葬器物数量等方面,与已发掘的以宝鸡地区为核心的关中西部及邻近地区的商周时期相关墓葬进行比较,以初步推断石鼓山 M4 的级别。

### (一) 墓室

石鼓山 M4 为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室底部长 4.28、宽 3.8 米,面积约 16.26 平方米<sup>[3]</sup>。与宝鸡市区已发掘的西周早期墓葬相比,可大致了解该墓在西周早期墓葬中的级别<sup>[4]</sup>。在宝鸡市区的西周早期墓葬中,与石鼓山 M4 面积最为接近的是石鼓山 M3。石鼓山 M3 的墓坑亦近长方形,墓底长 4.3、宽 3.6 米,面积约 15.48 平方米<sup>[5]</sup>,其墓室面积小于 M4。宝鸡竹园沟 M13,

墓底长 3.75、宽 3.8~4.4 米,面积约 15.4 平方米<sup>[6]</sup>,是邰国墓地西周早期墓葬中墓室面积最大的墓葬,也是石鼓山墓地发掘之前宝鸡一带西周早期墓室面积最大的墓葬,但墓室面积仍旧小于石鼓山 M4。由此可见,石鼓山 M4 是目前宝鸡市区西周早期规模最大的墓葬<sup>[7]</sup>。不仅如此,在目前发现的刘家文化墓葬中,石鼓山 M4 的墓室面积也是最大的。

### (二) 壁龛

石鼓山 M4 共设壁龛 8 个,其中东侧墓壁 3 个,西侧墓壁 2 个,北侧墓壁 3 个。该墓属于壁龛类墓葬,而多龛是其又一特别之处。

商周时期设有壁龛的刘家文化墓葬<sup>[8]</sup>,目前在关中西部及邻近地区已发现近百座<sup>[9]</sup>,壁龛数量达到 8 个的仅石鼓山 M4 一座,是为最多。石鼓山 M3 的壁龛数量次之,为 6 个。其他墓地的壁龛墓<sup>[10]</sup>,绝大多数只设 1 个壁龛,少数设 2~3 个壁龛(表一)。

宝鸡高家村墓地发现刘家文化墓葬 19 座,其中带壁龛的有 14 座,各设壁龛 1 个,以 M22 的墓室面积最大<sup>[11]</sup>。宝鸡林家村墓 1 座,设壁龛 1

表一 刘家文化壁龛墓统计表

墓葬	墓室面积 (平方米)	壁龛数 (个)	青铜礼器(件)	陶器等(件)
石鼓山 M4	16.26	8	50	高领袋足鬲 1、罐 1
石鼓山 M3	15.48	6	31	高领袋足鬲 1
高家村 M22	3.7	1	无	高领袋足鬲 3、罐 5
林家村墓	不详	1	鼎 1、方座簋 1	高领袋足鬲 2、罐 2
凤翔西村 79M42	7.4	3	分裆鼎 1、盆式簋 2	锥足鬲 1、罐 1
凤翔西村 80M80	4.95	2	盆式簋 1	锥足鬲 1、罐 1
贺家村 73M1	11.9	1	鼎、簋、甗、罍各 1, 卣 2	被盗不详
贺家 II D2M1	3.3	1	无	联裆鬲 1、罐 1
王家嘴 III B4M1	6.3	1	被盗不详	高领袋足鬲 2
刘家墓地 M49	2.9	1	无	高领袋足鬲 1、罐 11
碾子坡 1983 年	春 M118	1.4	无	袋足鬲 1、彩陶片、红褐色陶片
	秋 M177	1.7	无	贝
	秋 M181	2.2	无	袋足鬲 1
	秋 M185	1.3	无	袋足鬲 1
崇信香山寺墓	1.37	1	无	高领袋足鬲 3、罐 4

个<sup>[12]</sup>。凤翔西村 79M42, 设壁龛 3 个; 凤翔西村 80M80, 设壁龛 2 个<sup>[13]</sup>。岐山贺家村 73M1, 设壁龛 1 个<sup>[14]</sup>。岐山贺家 D2M1、王家嘴 B4M1, 亦各设壁龛 1 个<sup>[15]</sup>。扶风刘家墓地 M49, 设壁龛 1 个<sup>[16]</sup>。长武碾子坡先周晚期墓葬均为小型墓葬, 面积多在 2 平方米左右, 其中 68 座墓葬设有壁龛, 唯 1983 年秋 M177、秋 M185 各设壁龛 2 个, 1983 年春 M118、秋 M181 各设壁龛 3 个, 其余 64 座墓葬各设壁龛 1 个; 西周墓葬中有 1 座设有壁龛<sup>[17]</sup>。甘肃崇信香山寺先周墓 1 座, 设壁龛 1 个<sup>[18]</sup>。

依据上述统计可以看出, 带壁龛的刘家文化墓葬, 其墓室面积越大, 壁龛数量也相应较多; 墓室面积接近或者超过 5 平方米时, 才可能随葬青铜礼器。墓室面积、青铜礼器的数量与壁龛数量, 表现的是正关联的关系。墓室面积越大、壁龛数量越多, 随葬的青铜礼器数量相应也多, 墓主人的身份也应越高。在目前发现的刘家文化壁龛墓中, 石鼓山 M4 壁龛数量最多, 反映出其级别也应该较高。

### (三) 青铜礼器

石鼓山 M4 随葬的青铜礼器包括食器 40 件、酒器 9 件、盥器(盘) 1 件, 共 11 类 50 件, 总重 256.9 千克。M4 : 315 鼎最重, 为 19.8 千克, 高 46.6 厘米。M4 : 304 罍最高, 达 51.8 厘米, 重 12.55 千克。宝鸡地区已发现多座西周早期或商代末期的墓葬, 就一座墓葬而言, 目前石鼓山 M4 出土的青铜礼器数量最多<sup>[19]</sup>。居第二位的是石鼓山 M3, 出土食器、酒器、盥器等青铜礼器共 14 类 31 件, 总重约 219 千克<sup>[20]</sup>。在石鼓山墓地发掘之前, 宝鸡地区出土青铜礼器数量最多的西周早期墓葬是竹园沟 M13, 共出土青铜礼器(含铙 1 件) 26 件; 其次是竹园沟 M4, 出土青铜礼器 23 件; 第三是竹园沟 M7, 出土青铜礼器(含钟 3 件) 20 件(表二)<sup>[21]</sup>。

据统计可知, 石鼓山 M4 随葬的青铜礼器, 不仅总数、总重在宝鸡地区西周早期墓葬中处于前列, 而且器类也很丰富, 多达 11 类, 包括鼎、簋、盂、簠、甗、甗、壶、罍、尊、牺尊、盘。最重器的重量、最大器的高度, 仅次于石鼓山 M3。

其精品为数不少,更有数件器物首见或少见于西周早期,如簠、牺尊(鹿形)、球腹簋等。诸多信息均显示出石鼓山 M4 墓主身份较高,与石鼓山 M3 的墓主应该相近。

根据以上比较可知,在宝鸡市区西周早期墓葬及设有壁龛的刘家文化墓葬中,石鼓山 M4 墓室面积最大,随葬青铜礼器数量最多,器类也很丰富,青铜重器的高度、重量也处于前列,并有多件西周早期首见之物。该墓多项指标在同期或同类墓葬中遥遥领先,显示出石鼓山 M4 级别很高,表明墓主身份贵、待遇隆,有可能是该区域当时级别很高的首领或其配偶<sup>[23]</sup>。

## 二 青铜礼器的属性

借鉴学界最近的研究认识和方法<sup>[23]</sup>,可将石鼓山 M4 出土的数十件青铜礼器,依据形制、纹饰、工艺、铭文等方面的特征分为三组(M4:204、213 鼎残甚,暂不分组),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属性或时代特征(表三)。

第一组,属于典型的殷商文化青铜礼器。

在商周时代,族徽、日名是殷商文化青铜礼器的主要标志之一,有着族徽、日名或者二者俱有的青铜器,其族属一般就属于殷商系统<sup>[24]</sup>。据此,可将石鼓山 M4 中具有族徽、日名的 8 件青铜礼器归入殷商文化系统,包括子父丁鼎(M4:202、303)、父丁鼎(M4:305)、韦亚乙方鼎(M4:503)、史母庚壶(M4:101)、臣辰父乙壶(M4:504)、夙壘(M4:304)、崑父辛甗(M4:307)。

这 8 件器物之外,还有曲腹簋(M4:206)、直腹簋(M4:207)、尊(M4:210)、方鼎(M4:501)

4 件青铜礼器,尽管没有族徽或日名,但与殷商青铜器的器形、纹饰等特征相同或者相近,也可能属于殷商文化系统。

上述这 12 件青铜礼器,铸造工艺大都很精湛,纹饰多是三层、线条精细、凹凸感强,器物形制和纹饰大都呈现出殷商文化青铜器的典型特征。就器形而言,簋的曲腹、直腹和尊的三段体等都是殷商文化青铜礼器的典型形态;就纹饰而言,涡纹、连珠纹、连体兽面纹、列旗兽面纹等都是殷商青铜礼器所普遍流行的;就铭文而言,其中 8 件青铜礼器的族徽和日名,凸显出它们具有殷商文化的典型特征。综合器形、纹饰和铭文等信息,初步确定这 12 件青铜礼器属于殷商文化,可能来自于宝鸡以东的殷墟等区域。

第二组,与先周文化相关的青铜礼器。

先周文化晚期特别流行的青铜礼器是乳丁纹鼎、簋<sup>[25]</sup>,石鼓山 M4 随葬了这些与先周文化相关的青铜礼器。这类青铜礼器,在器形特征方面,造型一般较简单,器壁多较薄,鼎多为浅圆腹、柱足,簋为盆式或者带双耳;在纹饰方面,凹凸感较弱,线条多为阳线,乳丁纹短小尖锐或低钝而形圆,所饰兽面简化并已呈解体状。石鼓山 M4 随葬此类器有 13 件,包括乳丁纹鼎 2 件(M4:801、802)、盆式簋 9 件(M4:103、301、401、601、603、604、805~807)、双耳簋 2 件(M4:201、502)。

第三组,属于商周之际的青铜礼器。

在石鼓山 M4 中,还有一些青铜礼器,或体形较大、造型瑰丽,或扉棱张扬、纹饰精美,虽没有铭文,但铸造工艺精湛。石鼓山 M3 也出土有此类器物,有学者称之为“真正具有时代特

表二 宝鸡地区西周早期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登记表

墓葬	总数(件)	总重(千克)	器类	最重(千克)	最高(厘米)	首见或少见器
石鼓山 M4	50	256.9	11	19.8(M4:315 鼎)	51.8(M4:304 壘)	牺尊、球腹簋、簠
石鼓山 M3	31	219	14	41.8(1 号禁)	63.7(户彝)	禁、户彝
竹园沟 M13	26	53.53	14	4.75(BZM13:20 簋)	36.3(BZM13:24 壶)	
竹园沟 M4	23	44.45	11	4.95(BZM4:14 甗)	33.2(BZM4:8 壶)	
竹园沟 M7	20	56	9	6.7(BZM7:1 鼎)	36.8(BZM7:1 鼎)	

表三 石鼓山 M4 出土青铜礼器的分组

殷商文化的青铜礼器		与先周文化 相关的青铜礼器	商周之际的青铜礼器		
有日名或族徽	无日名或族徽		具有时代特征的	当地之一类	当地之二类
壶(101)	簋(206,207)	簋(103)	四耳簋(208)	甗(102)	甗(203)
鼎(202)	尊(210)	簋(201)	孟(211)	甗(311)	罍(205,209)
鼎(303,305)	方鼎(501)	簋(301)	牺尊(212,214)	鼎(315)	甗(302)
罍(304)		簋(401)	鼎(215)		鼎(306,313)
甗(307)		簋(502)	孟(308)		盘(310)
方鼎(503)		簋(601,603,604)	附耳鼎(309)		罍(312)
壶(504)		鼎(801,802)	方座簋(314)		鼎(602)
		簋(805~807)	簠(803,808)		
			球腹簋(804)		
12		13	11	3	9
占总数的 24%		占总数的 26%	占总数的 46%		

征的青铜器”<sup>[26]</sup>。这类器物一般具有特别的图案或纹饰,如长翅羽凤鸟纹、长乳丁纹、卷尾龙纹等;器形大多也很独特,如方座、方体、球腹、四耳等。这类器物以前不见或少见,就造型、纹饰及铸造工艺而言,大都有着很高的水准,其中部分器物比前述第一组器物还要精致。石鼓山 M4 出土的青铜礼器中,具备这些特征的器物有 11 件,包括牺尊(M4:212、214)、兽面纹鼎(M4:215)、附耳直棱纹鼎(M4:309)、球腹簋(M4:804)、方座簋(M4:314)、四耳簋(M4:208)、簠(M4:803、808)、孟(M4:211、308)。这些青铜礼器的制作工艺水准远远超过宝鸡本土器物(与先周文化相关的),并且深深印有殷商系统的精湛工艺,但在器形、纹饰等方面却不同于殷商系统,展现出一种新式样,出现多种新因素。这种情形体现了社会“大变革”的形势,即殷商青铜工匠由于种种原因,在商周之际使用先进的铸造工艺为周人政权服务,表现周人(广义)新的社会观念<sup>[27]</sup>,同时表明了这些器物制造的时间当在商末或西周早期。

另有一些青铜礼器,铸造工艺一般,纹饰简略,有些甚至工艺草率,纹饰亦很粗糙,形态简陋,不类殷商系统器物,也不便归于与先周文化相关的器物。如兽面纹鼎(M4:315),粗糙异常,补铸多处,范缝歪斜,范线凸起,没有

打磨;甗(M4:102、311),器壁薄脆,腹部存有固定环钩时的铸痕。这 3 件器物工艺草率,不见打磨或使用痕迹,似乎是特意随葬而铸造,应是当地当时的产品,而不是外来物或者前时段的传留物。其中有些可能是为“凑数”而铸造的,如 M4:315 兽面纹鼎,与 M4:215 兽面纹鼎相比,两者造型、纹饰相近,大小相仿,但前者粗劣、未加打磨,后者精致且有烟炱等使用痕迹。

此外,还有 9 件没有族徽或日名的青铜礼器,虽然器形与殷商器物近同,一些纹饰与殷商器物流行的纹饰相仿,如菌状捉手、蝉纹、蕉叶纹、涡纹等,但不及殷商器物精致。这类器物包括蝉纹鼎(M4:306)、列旗兽面纹鼎(M4:313)、甗(M4:203)、罍(M4:205、209、312)等。综合上述情形,并与第一、二组器物比较后,判断这类器物应该也是当地当时的产品,可归入第三组。需要指出的是,简化兽面纹鼎(M4:602)、甗(M4:302)、盘(M4:310),几无纹饰,形态简单,但铸造尚可,似也可以归入第三组。

由此,石鼓山 M4 中第三组器物还可细分为三类:第一类铸造工艺高超,是当时风尚的代表;第二类与前者大不相同,工艺简单,甚至粗糙,形态朴素或简陋,可能是仅为随葬而铸造,应是当地当时的产品;第三类没有铭文,铸造尚可,器形、纹饰大多近于殷商器物,也应是

当地当时的产品。

石鼓山 M4 出土的青铜礼器,其“组”别大致表现如下:殷商文化器物有 12 件,占总数的 24%,器类有鼎、簋、甗、壶、尊、罍,以酒器为特色;与先周文化相关的器物有 13 件,占总数的 26%,器类有鼎、簋,均为食器;商周之际器物有 23 件,占总数的 46%,以少见或者首见的器物为主,如牺尊、附耳直棱纹鼎、球腹簋、四耳簋、簠、孟等。

一般而言,墓葬形成时间与随葬器物中年代最晚的器物最为接近。石鼓山 M4 随葬的青铜礼器以第三组器物年代最晚,其中部分器物可能在商末,而多数应在西周早期,表明该墓的年代已进入西周早期。

《初识》依据石鼓山 M4 随葬有高领袋足鬲,推定其为刘家文化墓葬。内涵不同、铸造工艺有别的三组青铜礼器共存于该墓,反映了墓葬所处的西周早期社会正在或者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商末周初对殷商战争的胜利,致使较多的殷商青铜礼器出现于西土宝鸡地区。殷商工匠迁往关中并为周人所用,大幅度提升了周人青铜礼器的铸造工艺。造型张扬、反映时代巨变而与殷商文化有别的器物,目前在宝鸡地区已出土不少,不过还没有发现确切的铸造线索。另外,与先周文化相关的青铜礼器在该墓中的存在,反映了刘家文化与姬周文化的融合<sup>[28]</sup>。

### 三 青铜礼器的组合

#### (一) 礼器的成对组合

石鼓山 M4 随葬的青铜礼器有一个特点,就是多件器物两两“成对”,它们形制相同,纹饰大多一致,或有精致、粗疏之别,大小几近,唯个别有大小之别。成对的两件器物或置一龕,或分置两龕。例如,子父丁鼎 2 件(M4:202、303)、兽面纹鼎 2 件(M4:215、315)、乳丁纹鼎 2 件(M4:801、802)、方鼎 2 件(M4:501、503)、双耳簋 2 件(M4:201、502)、簠 2 件(M4:803、808)、牺尊 2 件(M4:212、214)、壶 2 件(M4:101、504)、甗 4 件(M4:102、311;M4:203、307)。如果再算上盆式簋,则成对的

器物超过 10 组。一座墓葬中出现如此多的“成对”器,比较少见。该墓随葬器物“成对”的特点,很可能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

#### (二) 以龕为单位的组合

《初识》对青铜礼器组合进行了简单归纳,如各壁龕的青铜礼器以鼎、簋为主;7 个壁龕内有簋,少则 1 件,多则 4 件;5 个壁龕内有鼎,至少 1 件,最多达 6 件。依据上文对青铜礼器的分组,可以发现出土青铜礼器的 7 个壁龕均有第二组器物,其中 K1~K3、K6、K8 同时出有第三组器物,而殷商文化器物只见于 K1~K3、K5 计 4 个壁龕。殷商文化器物,不仅在数量上弱势,而且只存在于部分壁龕。第二、三组器物合计达 36 件,占总数的 72%,不仅在数量上占有多数,而且还遍及出有青铜礼器的壁龕。具有宝鸡当地特色的盆式簋、双耳簋、乳丁纹鼎等,至少有一件见于出有青铜礼器的各龕。出有簋的 7 个壁龕中,有 5 个(K1、K3、K4、K6、K8)存在当地的盆式簋,表明当地的盆式簋具有明显的普遍性。在宝鸡当地生产的青铜礼器,不仅在随葬青铜礼器的数量上占有相对优势,而且在墓葬内的空间分布上也占据相对优势,显示了当地因素在石鼓山 M4 中的普遍性和显著性。

另外,石鼓山 M4 随葬的青铜礼器中,食器所占比例较大。在 50 件青铜礼器中,鼎有 15 件,簋有 16 件,二者之和超过青铜礼器总数的五分之三。这一情形体现了“重食”文化的特点,而重食传统是周人(广义)文化的重要特点,与商人重酒传统不同<sup>[29]</sup>。

###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从墓室规模、壁龕数量及随葬青铜礼器数量等方面来看,在宝鸡市区西周早期墓葬及设有壁龕的刘家文化墓葬中,石鼓山 M4 的级别均很高。其次,石鼓山 M4 随葬的青铜礼器可分为三组,其中与先周文化相关的第二组青铜礼器以及属于商周之际的第三组青铜礼器,它们的造型、纹饰、工艺等特征体现了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特征。第三,随葬青铜礼器“成对”现象普遍,是

石鼓山 M4 的一大特色,或者也可能是一种时代特色;墓葬中以瓮为单位的青铜礼器组合情况,反映出石鼓山 M4 随葬的青铜礼器以当地文化因素为主,而鼎、簋的组合,已经明显表现出西周用鼎、用簋制度的雏形。

石鼓山 M4 的发掘和收获,具有与石鼓山 M3 同样重要的内涵和研究意义。M4 的发现,再次丰富并深化了对商周时期关中西部地区刘家文化的认识。同时,该墓是宝鸡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基本确定的西周早期墓葬之一,可以推进商末周初遗存的辨识。另外,石鼓山 M4 随葬青铜礼器所呈现的面貌、组合等信息,对于探讨西周初期关中西部姬姜部族文化的融合以及西周青铜礼器组合的雏形具有重要意义。

-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 M4 发掘简报》,《文物》本期。
- [2] 王占奎、丁岩《石鼓山商周墓地 4 号墓初识》,《周野鹿鸣——宝鸡石鼓山西周贵族墓出土青铜器》,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 年。下文简称《初识》。
- [3] 此时期墓葬的开口处多被破坏,而墓室底部大多保持原状,故以此比较。
- [4] 从墓葬形制来看,商周时期墓葬级别由高到低依次是“亚”字形、“中”字形、“甲”字形和竖穴土坑形。同类形制的墓葬,主要以墓葬面积的大小来区分级别。宝鸡地区目前还未发现与石鼓山 M4 规模接近的商代墓葬,故本文将讨论的时代限定在西周早期。
- [5] 石鼓山考古队《陕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3 年第 2 期;石鼓山考古队《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西周墓》,《考古与文物》2013 年第 1 期。
- [6] 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强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 年。
- [7] 宝鸡地区以外规模最大的西周早期墓葬,可能是咸阳淳化史家塬 M1,其墓室长 6.3、宽 4.85 米,面积约 30.6 平方米。参见淳化县文化馆《陕西淳化史家塬出土西周大鼎》,《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 2 期。
- [8] 本文将设置于墓坑壁面上的瓮,包括头瓮、侧瓮、脚瓮,统称为壁瓮。雷兴山仅将侧瓮作为壁瓮,以示与头瓮有别,认为“头瓮与壁瓮之别,可能与族属有关”。参见雷兴山《先周文化探索》,第 178

页,科学出版社,2010 年。

- [9] 壁龕墓部分信息参见张懋镕《宝鸡石鼓山墓地文化因素分析》,《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4 年。
- [10] 宝鸡戴家湾墓地有些墓葬设有壁龕,但详情不知。参见任雪莉《宝鸡戴家湾商周铜器群的整理与研究》,线装书局,2012 年。
- [11] 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宝鸡高家村刘家文化墓地发掘报告》,《古代文明》(第 7 卷),文物出版社,2008 年。
- [12] 阎宏斌《宝鸡林家村出土西周青铜器和陶器》,《文物》1988 年第 6 期。
- [13] 韩伟、吴镇烽《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4 期。
- [14] 陕西省博物馆等《陕西岐山贺家村西周墓葬》,《考古》1976 年第 1 期。
- [15] 周原考古队《2001 年度周原遗址(王家嘴、贺家地点)发掘简报》,《古代文明》(第 2 卷),文物出版社,2003 年。
- [16]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7 期。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邠州·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年。
- [1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崇信赤城香山寺发现先周墓葬》,《崇信于家湾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 年。另外,在于家湾周墓中,有 7 座设有壁龕,但未随葬高领袋足鬲,年代为西周早、中期;有 4 座随葬高领袋足鬲,但不设壁龕,其中 3 座年代为商代晚期,1 座年代在西周早期偏早阶段。本文未纳入比较。
- [19] 宝鸡戴家湾墓地由于青铜礼器出土单位不明确,故不参加比较。
- [20] 同[5]。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郝明科馆长提供了中臣登分裆鼎(M3: 81)、凤鸟纹卣(M3: 15)两器的重量。
- [21] 同[6]。为反映全貌且易于比较,在统计竹园沟墓葬出土青铜礼器总数和总重时,钟、铙计算在内;在比较个体器物大小轻重时,二者不计。
- [22] 与西周早期燕侯、晋侯、曾侯、应侯等诸侯墓葬资料比较,石鼓山 M4 的墓主应略低于侯或侯夫人一级。
- [23] 张天恩《石鼓山户氏青铜器相关问题简论》,《文物》2015 年第 1 期。
- [24] 张懋镕《周人不用日名说》,《历史研究》1993 年第 5 期;张懋镕《周人不用族徽说》,《考古》1995 年第 9 期;张懋镕《再论“周人不用日名说”》,

《文博》2009年第3期;张懋镕《再论“周人不用族徽说”》,《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

[25] 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第233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26] 同[23]。

[27] 张天恩《商周之际青铜制造重心徙移的观察》,

《金玉交辉——商周考古、艺术与文化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

[28] 同[23]。

[29]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西周重食文化的新认识——从甘泉县阎家沟新出青铜器谈起》,《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1期。

(责任编辑:周艳明)

· 新书推荐 ·

## 郢靖王墓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荆门市博物馆 编著

钟祥市博物馆

郢靖王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二十四子朱栋,生前被册封在湖北省钟祥市。郢靖王墓包括陵园建筑基址和墓葬本体。陵园建筑遗迹主要有碑亭基址、享殿基址等,发现了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构件以及石碑、石雕。石碑碑身正面、背面均有碑文,详细记载了洪熙、宣德、正统、天顺年间四次御祭郢靖王的情形。墓葬本体由封堆、墓圻、墓道及玄宫组成。玄宫内部主要由前室、中室、后室组成。

墓志记载了郢靖王的生平,可以和文献记载互证,有补史和证史作用。墓室内随葬金器、银器、铜器、瓷器、漆木器、玉石器等,其中的青花龙纹梅瓶、青花“四爱图”梅瓶尤为精美,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该墓的发掘为进一步研究明代王陵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文物出版社 2016年1月出版 精装 大16开 定价430元